

打拐者说

一位“打拐”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

本报记者毛鑫、王瑞平

在公安系统里，“打拐民警”是个特殊的“工种”。

在被拐孩子父母蹉跎、阴暗的寻子岁月里，他们是唯一透进来的光；在他们自己看来，打拐不只是破案，而是在法律、人伦间的一场跋涉。

排查线索、走访取证、抓捕嫌犯，常常面对受害者家属无法释怀的锥心之痛和难以解脱的日夜折磨，还要设法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，每一项都如千钧之重。

而亲人的相认并不是解救的结束，多数是解救的开始。被拐孩子的心灵、被拐孩子的家庭，都需要被“解救”。团聚，绝不是一场相会，而是漫长的磨合与碰撞，有时甚至血泪相加。

“我们始终面临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和难以量化的情感，在追求法律公正之外，还要尽力修补人伦裂痕。”广州市公安局打拐民警刘彦佑说。

见证：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

罗艳不敢想，跟自己心心念念的骨肉团圆，要花掉她整整22年的青春。这几乎是她至今全部生命的一半。

“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，支持罗艳和张某某符合亲生关系。”2021年12月28日下午，在广州花都分局分局举办的“团圆行动”认亲会上，刘彦佑向罗艳宣读了亲生关系鉴定文书。

随后，一扇门被缓缓推开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走进来，罗艳上前一把抱住儿子，一个劲哭着说：“妈妈找你太久了……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……”

22年，八千多个日夜，这是一份“不愿放弃的母爱”。

50岁的罗艳是四川古蔺县人，1999年7月16日，她带着11个月大的儿子小蔺川来广州花都寻亲，正在筹备孩子一周岁生日时，儿子被两个老乡拐走，从此踪迹全无。

此后22年里，她独自一人，一边打零工，抚养身体不好的大女儿，一边满世界找儿子。她去广东、福建、四川很多地方，哪里有打听到人贩子的同乡人，她就扑到哪里去。一次次满怀希望去，载着疲惫回。

房租交不起，她从出租屋搬出来，在天桥下睡了三个月。之所以选择天桥，只是因为夜里还有流浪人员相伴，“比较安全”。

“有几次我苦得不想活了，只是可怜我那个身体不好的女儿没人养没人疼，咬咬牙又挺住了。”罗艳哽咽着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她用力揉着眼，抹掉滚落的泪水。

为了寻找人贩子，她将原来的名字“罗文端”改成“罗艳”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她前些年还把家安在了人贩子老家旁边的镇，以便能及时打听他们的动态。

“现在想想，全靠心里那口气撑着才活过来。”罗艳说，“哪怕还有一口气，我也要找到儿子。”

苦心人，天不负。2020年，广州公安在积案排查中将本案列为重点案件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各方面调查线索和技术力量汇聚，2021年春，藏匿22年的人贩子分别被广州花都警方抓获。

但此时离柳暗花明还差一步。“原本我们也以为抓到了人贩子，孩子很容易找了，没想到现实生活还在出难题。”刘彦佑告诉记者，两个人贩子对在1999年7月左右将罗艳的小孩拐走并卖到汕头一事供认不讳，但时过境迁，汕头当地拆迁重建，早已物是人非，两名入贩子无法提供被拐儿童吴蔺川的买家信息和准确地点，给警方的解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。

刘彦佑和同事仍然没有放弃寻找。12月，通过搜集吴蔺川姐姐川川小时候的照片，成功比中汕头一名疑似被拐男子。经过DNA复核鉴定，确认该男子就是被拐22年的小蔺川，成功完成了解救工作。

（上接1版）“坝上地区具有优质风能和太阳能，是国家规划的9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。在拥有多项世界第一的张北柔性直流工程投运后，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盖。”国网冀北电力副总工程师兼冬奥办主任康健民说。到冬奥会结束时，崇礼冬奥会场馆预计消耗“绿电”约4亿千瓦时，预计减少标煤燃烧12.8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。

冬奥会期间，滑雪场造雪和生态保护都需要大量水源。古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场地经理魏庆华说，他们专门修建了一个20万吨的蓄水池，用于存储雨水和地表径流，同时，还选用先进技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，水雪转化比为1:1.7。

诸多措施大大减少了地下水开采。“目前，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用于人工造雪的非

2021年末，为了让这份苦苦等待22年的团圆不跨年，广州花都公安组织了这场认亲会，让他们一家人团圆。让人欣喜的是，认亲现场，蔺川决定跟随妈妈姐姐回四川老家一看看。

刘彦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见证被拐儿童家庭团圆的场景了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动。

“我也是个9岁孩子的父亲，每当看到认亲会上一个经历万千磨难的家团圆了，我内心的感觉都是无以言表的，也会忍不住流出泪水。”刘彦佑说。

6年多的打拐工作中，让刘彦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照片的故事。

几年前，广州公安刚开始尝试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寻找被拐儿童时，遇到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。一对湖南夫妻的孩子16年前被拐，刘彦佑在积案排查中找到他们，多次提出想要一张孩子小时候的照片，但孩子妈妈每次都是通过微信拍照片发给他，因为图片拍摄质量问题迟迟无法达到技术比对要求。

“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小孩子唯一一张照片，夫妻俩不舍得拿出来，怕丢了就一点念想都没了。”刘彦佑说，最后反复沟通，孩子妈妈相信我了才把照片快递寄给我，也就是靠着这张照片，我们找回她被拐16年的孩子。

这些年刘彦佑见到了太多为了寻子抛家弃业的父母，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汇聚起来，成为打拐民警们不懈前进的动力。“我们平凡的工作能给这些久经磨难的家庭第二次生命，善莫大焉。”他说。

打拐：在法律、人伦间的一场跋涉

“打拐不只是破案。”采访中，刘彦佑时不时会提到这句话。对他而言，打拐工作不同之处在于，它不光是铁面办案，也有人心情感，就像裁缝一样，尽量帮被拐儿童家庭修补情感伤痕。

“小朋友，你家里有没有你婴儿时期的照片？”

每次找到被拐失踪儿童后，刘彦佑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。这是他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：说话要婉转，为了降低孩子的警惕心，最好有老师在旁陪读。在打拐之前，刘彦佑一直从事打击盗窃犯罪，“虽然都是破案、追赃，但打拐找回来的，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要考虑的东西更多”。

2004年，湖南人温勇2岁的大儿子小温被邻居“偷走”，此后的近16年间，夫妻两人一直奔波在寻找儿子的路上，但迎头撞过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2019年年底，刘彦佑与同事帮助温勇夫妻找到了被拐近16年的孩子。孩子被拐时只有2岁，再见已是即将成年的大人。

解救孩子，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？刘彦佑没有立即这样做。他告诉孩子的父母，小温还有几个月高考，如果选择立即见面，很可能影响他的备考状态。思虑再三，孩子的父母同意高考后再与孩子相认。

“知道你们很忙，但是我忍不住，我太想孩子了，你能告诉我他现在过得还好吗？”“孩子个头是高还是矮？胖还是瘦？我想给他提前准备几件新衣服。”虽然暂时无法相认，但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抑制，经常在微信里给刘彦佑留言，希望知道关于孩子的一切信息。

刘彦佑能体会到对方的心情。高考还没结束，他就跑到了孩子所在的城市，向班主任打听孩子的情况，按照孩子的性格提前模拟见面场景。比对确认后，他又第一时间将孩子的照片发给了温勇夫妇，详细介绍孩子的生活、学习情况，尽自己所能，帮助这个破碎的家庭弥补16年分隔所带来的裂痕。

2020年高考刚过，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组织下，温勇夫妇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。如今温勇夫妇经常在朋友圈晒一家人的欢

雪道，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。然而在过去，崇礼“一矿独大”，矿才是山间的风光。

筹办冬奥会期间，崇礼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，冰雪旅游、体育休闲等产业蓬勃兴起，崇礼也从昔日的贫困县发展为如今的“雪都”。

“冬奥会申办成功前，崇礼只有4家滑雪场，如今已发展到7家，其中4家位列全国十强。”崇礼区体育局局长田永军说。近日，崇礼还入选了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区。

在大众滑雪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，国内外滑雪赛事也对崇礼青睐有加。田永军说，上个雪季，他们举办了100多项活动，包括世界杯、世锦赛、远东杯等国际国内高端赛事。



2021年12月31日，刘彦佑（左三）与小英一家合影留念。

受访者供图

乐时光，刘彦佑看到后都会顺手点个赞，“都是当父母的，我能理解那种心情”。

2015年，刘彦佑调入广州市公安局打拐办。6个年头，时间不长，但他经手的案件已有近千宗，亲自办结的接近100宗。“我们还在不断努力，想突破更多像吴蔺川被拐案这类时间比较长的案件。”他说，找回了多少名被拐失踪儿童，就见证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。

这些家庭中，最长的有人苦寻儿子40年，最终在病房里迎来了团圆时刻。也有被拐的孩子，一开始并不想与亲生父母相认。甚至有的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后，转头就会把父母微信拉黑。

“老实讲这些情况我们都遇到过，甚至可以说极少遇到欢欢喜喜愿意认亲、回归的被拐孩子。”刘彦佑说，作为打击犯罪的办案民警，我们抓到入贩子、找到孩子的那一刻其实就完成了任务，但法律之外，难以避开寻子父母常常遭遇的人伦悲痛。

当阿才（化名）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另有他人时，并不愿意认亲。他的养父母待他极好，而且养父离世不久，刚刚安葬。他对刘彦佑说：“我爸尸骨未寒，我怎么能去认另一个父亲？”

但阿才的亲生父母已经找了他整整26年，也痛苦了整整26年。刘彦佑只能多次找阿才的家人做思想工作。了解了阿才的顾虑后，刘彦佑许诺可以再给他一段时间平复心情，然后会亲自陪伴阿才与亲生父母相见。

差不多隔了一个月，刘彦佑接到了阿才的电话，说他准备好了。刘彦佑与同事从广州出发，一路向西，足足驾驶1000公里来到阿才的故乡。

“拐卖犯罪不仅毁掉了孩子的未来，更是祸害了两个家庭。”刘彦佑说，亲人的团聚并不是解救的结束，而往往是解救的开始。被拐孩子的心灵，被拐孩子的家庭一样需要被“解救”。

在对各类拐卖儿童的犯罪进行重拳打击的同时，广州公安也在解救中邀请专业心理专家介入，尽力弥合感情缝隙，刘彦佑也呼吁社会各界及广大有专业知识的热心人士，积极参与解救被拐儿童的公益事业上来，安抚孩子与家属受创心灵，解救这些特殊家庭。

期盼：“天下无拐”梦正在走近

随着公安科技化水平的提升，打拐成效越来越显著。近几年来，广州极少发生儿童拐卖案件，现在跟进的案件多数都是旧案积案，新发案件的破案率一直维持在100%，大部分案件都能在24小时之内找回被拐儿童。

雪装备研发制造、冰雪体育运动、冰雪文化旅游等在内的冰雪产业全链条发展体系。张家口市商务局副局长王铁军介绍，张家口建成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冰雪装备研发制造集聚区，吸引了法国MND、意大利天冰、美国M3等知名冰雪装备企业，集冰雪装备研发、设计、制造、检测于一体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初具规模。

与此同时，张家口还积极推进大数据、可再生能源、新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，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。在大数据产业方面，全市现已投入运营或部分投入运营数据中心12个，在建数据中心项目7个，投运服务器100万台，成为国内大数据产业发展速度最快地区之一。（记者李凤双、范世辉、郭雅茹、杨帆、秦婧）

新华社石家庄1月9日电

2020年8月4日早上8时，住在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祝先生拨打110报警，称其未满2岁的孙子小文自己跑出家门不见了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迅速组织排查，中午即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和住址。

据查，嫌疑人先是将孩子带回了自家的出租屋，换装后又将孩子从另一条路带出来，并坐上长途大巴。一路追查，警方发现嫌疑人藏匿在英德市，最终成功解救孩子。从警方接到报案到成功破案找回孩子，仅过去11个小时。

当然，打拐并不总是如此顺利、轻松，也时常面临生命危险。

有一次，刘彦佑带队去云南抓一个人贩子，拐进山区，一路上不时遇到石头滚下来，好几次险些砸到车。车不能走了，一行人冒雨钻进嫌疑人村寨边的密林里埋伏。他们被当地民警告知，脚下这块山体是滑坡泥石流灾害高发区，雨季更是非常危险。脚下泥土已经非常松软，双脚都陷进去了，行走困难，但看到嫌疑人的一刻，他跟同事还是毫不犹豫扑了上去。

“在那个情况下，如果稍微不小心可能连人一起陷到泥里面，或者被埋到山崖下面。”刘彦佑笑着说，也可能是老天眷顾，知道我们在做好事，才一切顺利回来。

被拐40年的李某、被拐31年的朱某、被拐15年的申某等陆续被找回……对陈年积案，公安机关也在不断开展清理行动。公安部数据显示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破获拐卖儿童案件5000多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2.3万名，解救一大批被拐卖儿童，拐卖儿童犯罪年发案数逐年下降，由2012年的5907起下降至2020年的666起，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年发案数降至20起左右，破案率达95%以上。

“现在，有了不断更新的打拐DNA系统、团圆行动技术平台，越来越多的被拐儿童与亲生家庭团圆。”刘彦佑说，实现“天下无拐”的愿望越来越近了，我也期待儿童被拐入地相关部门未来能给予更积极的配合。

2021年12月31日，刘彦佑主持了一年最后一场认亲会，一个在广州与父亲走失26年的女孩小英与广西的父母相认。

在刘彦佑的朋友圈里发了这段相认视频：房门打开，小英走了进来，妈妈一把抱住了女儿痛哭，背后头发已经花白的父亲稍显木讷地站着，一个劲抹眼泪。镜头里并未出现刘彦佑的身影。

“今年最后一对，新年继续努力！”刘彦佑把这句话置顶在了视频上面。

唐古拉山近在咫尺，可可西里就在脚下，天路之巅，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——唐古拉站在此矗立。

海拔4547米的唐古拉山镇，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公安处沱沱河派出所的25位民警常年在此坚守，管辖青藏铁路582公里线路，负责管内27个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汽笛声响彻荒漠深处，距铁路不足百米，派出所小院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在这个连站立都会气喘吁吁的地方，民警们日复一日在此坚守，用热血铸就守护“天路”的金色盾牌。

“大声”

再次见到郑天海，是在格尔木火车站的站台上，他带着棉帽，站在站台的垃圾桶边抽烟，相比之前在沱沱河，他的脸圆润了不少，看见记者，他掐灭烟头迎了上来。

“郑所长好久不见啊！”

“你说啥？大声点！”

2020年4月，在沱沱河派出所坚守10年的老所长郑天海调到了格尔木公安处技术侦查大队任大队长。10年，已经让他的身体多次亮起“红灯”：体检中，有23项指标不合格，长期高原生活造成的神经性耳聋愈发严重，面对面也经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。

“在高原待的时间长了，就有个‘三大一小’的说法。‘三大’就是心大、肺大、血管大，一小嘛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“耳朵眼小呗”。

“老田心脏不好，我也有点，教导员的心肺都不好，你别看沈所长刚来所里1年多，他也有20多项指标不正常呢。”副所长蒲海春走过来，长期的高原生活让铁路民警们的身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，“郑所长才四十多就已经听不见了，我估计我们这帮兄弟也差不多了”。

有次巡线路上，风大雪急，郑天海开车载着几个民警往回赶，开着开着车突然熄火了，郑天海急忙跳下车去，打开引擎盖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他给车里的蒲海春示意，把车打着，蒲海春打着发动机，看郑天海在汽车前面趴着听，听着听着吼起来：“让你打火啊！”

蒲海春一脸懵地看着郑天海，原来火已经打着了，只是他听不见……

“把所长从沱沱河调到格尔木挺好的，心里虽然舍不得，但对他的身体有好处，至少能不再变坏。”蒲海春说。

在旁边一直抽着烟听我们说话的郑天海拍了拍蒲海春的肩膀：“老蒲，你们说啥？大声点！”

向前三步，敬礼！

国道109京拉线，与青藏铁路几乎平行，起伏的黑色路面与平整的钢轨携手奔向拉萨。

“过了格尔木南山口检查站，就是西藏路政在养路了，你看铁路沿线隔一段就出现的小房子，就是铁路护路点，平时护路队员们都住在这。”蒲海春一手开着车，一手指了指远处的小平房。

在灰蒙蒙的荒漠中间这些小房子格外显眼，更显眼的是房前站着的护路队员，他们看到警车过来，向警车的方向三步走，敬礼。

“这是在给我们打招呼呢。”蒲海春打开警笛开关，向护路队员鸣笛致意。“人迹罕至的高原，守路护路都不容易，不管是养路工、护路队、武警官兵还是我们公安。”蒲海春说，他们这次也计划去护路队看看，马上年要过年了，一方面叮嘱他们注意安全，另一方面也给他们送上节日祝福。

一路走下来，只要有小平房的地方，警车就会鸣笛，而一旁的护路队员不管是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向前三步敬礼。

“修这两条路很难，我们都是一起保护它的人，我们就是好朋友。”来到铁路护路队驻地，青藏铁路通天河护路大队教导员胥青说个不太熟练的普通话，拉着沱沱河派出所所长沈卫平的手说个不停。“你放心，虽然今年疫情原因火车少、人少，但我们还是照常巡护，不会粗心的。”

沈卫平将节日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一一嘱托，转身又踏上了巡线之路。警车刚刚走出护路队大院，胥青就带着队员们站成一列，向前三步，冲着警车慢慢退去的尾灯敬了一个礼。

“奔达！贡康桑！”

站在离派出所不远的长江源特大桥边，冰封的河面宽阔而静谧，远处的山顶上白雪皑皑，这个因唐古拉山而得名的小镇是青藏铁路线上最高的车站之一，也是藏族同胞世代居住的家。

一大早，天气难得的晴朗，吃过早饭，民警们将米、面、油、饮用水和一些生活用品装上汽车，他们今天上午的任务是去牧户家里慰问。

55岁的牧民革命花已站在家门口笑吟吟地等着，民警们刚一下车，革命花就握住副所长蒲海春的手：“奔达（兄弟）！贡康桑（你好）！”

“革命花和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义务护路队员，在铁路沿线看到可疑人员会给我们打电话，还会帮我们宣传爱路护路知识。他也是我们的定点帮扶户。”蒲海春话音未落，革命花一家就已拿来哈达给民警们一一献上。

民警们把带来的“新年礼物”搬进家里，革命花的女儿贡确卓玛为民警端上了热腾腾的酥油茶。

“节过得好吗？今年收入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吗？”蒲海春坐在革命花身边，藏族协警布群在一旁担当翻译，革命花脸上一直挂着笑，“都挺好的，党的政策好，帮我们卖牦牛，今年赚了好几万呢。”革命花指了指家里的新电视，“这就是今年买的！”

对于革命花6岁的外孙嘎嘎来说，这些穿警服的伯伯都不是陌生人，他坐在民警田长松的腿上，脑袋靠着田长松，用不太熟练的汉语为大家背诵了一首古诗，大家都鼓起掌来。

“我们大多数都搬到了格尔木的长江源村住。”贡确卓玛端着茶壶给大家不停添茶，“警察大哥们特别好，平时帮我们拉水送日用品，我们坐火车提的东西多了还会帮我们送上车，就跟家里的大哥一样”。

告别革命花一家，巡线的警车沿着铁路一头扎进茫茫荒野，铁路线上列车呼啸而过。“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把人间温暖送到边疆，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……”悠扬的歌声陪伴着这群热血男儿坚守在天路之巅。（本报记者王淳、耿辉凰）